

游牧经济“脆弱性”特点辨析:以锡林郭勒盟牧区为例

海山

(内蒙古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脆弱性”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是影响草原畜牧业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实地调查采访和查阅历史文献等研究方法,对时常被引用的内蒙古传统草原畜牧业经济“脆弱性”特点的“证据”以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近半个多世纪草原畜牧业发展历史进行分析,得出草原畜牧业的“脆弱性”及其经济损失主要不在于天灾,而在于人祸的结论。从生态功能关系而言,内蒙古高原与我国北半部地区是唇齿相依关系。游牧生产方式保护了内蒙古高原自己以及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生态环境几千年,使得中华文化顺利形成发展,未来仍然如此。因此,中国应当成为游牧生产方式的坚定捍卫者。

关键词: 游牧经济;脆弱性;自然灾害;地理环境;内蒙古高原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蒙古牧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呈现加剧之势。到目前,内蒙古牧区90%以上的草原出现程度不同的退化、沙化和盐碱化现象,其中1/3基本丧失生产力。纯牧业24旗市草场理论载畜量由20世纪60年代初的6000万羊单位降之21世纪初的3000万羊单位,迫使国家投入数千亿的巨额资金,采取“京津周边风沙源治理”、“围封转移”、“禁牧休牧”、“整体搬迁”等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以遏止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那么,内蒙古牧区为什么在短短20余年内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生态恶化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研究课题。这或许与我们对有关内蒙古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指导失误有密切关系。其中,就包括内蒙古传统草原畜牧业“脆弱性”特点理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个似乎没有争议的理论观点,认为,“脆弱性”是内蒙古传统草原畜牧业——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1],其主要依据是“自然灾害频繁”及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2][3]。而且这些结论正是改造内蒙古高原传统草原畜牧业的主要依据。笔者也曾认同这一观点[4]。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调查研究看来,这一理论观点值得商榷。

“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历来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但世界各地并没有都因此而称自己的经济是“脆弱”的经济。正如在特大洪水面前,平原地区的农业、聚落很脆弱一样,在突降的特大雪灾面前,游牧经济也的确脆弱,社会经济损失会很大;同样,在地震、台风、飓风、海啸等自然灾害面前,任何国家的交通、工业、城市也都很脆弱,每年也都在造成巨大社会经济损失。从历史角度而言,西汉时期繁荣一时的古楼兰农耕文明与其水草丰美的生态环境一同消失了。而地处远比古楼兰生态环境严酷恶劣得多的蒙古高原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和被认为“脆弱”的游牧经济却还存在至今。这说明了什么?

1368年以后的280多年间,内蒙古高原几乎战乱未断,但苏尼特部落畜牧业经济实力一直很强,经常作为强大部落参加战役,没有遭受大的自然灾害及损失的记录。而到清初,实行“盟旗制度”以后,游牧范围开始严格局限于旗内。1660、1682年,苏尼特草原两次遭受大雪灾,导致苏尼特右旗郡王贫困。清朝皇帝赈济该旗郡王,马100匹、牛50头、羊1000只,并允许他在察哈尔草原走“敖特尔”[5]。这又说明了什么?

如果一定要说,内蒙古传统草原畜牧业——游牧经济存在“脆弱性”问题,那么,内蒙古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主要基于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游牧经济的生产资料与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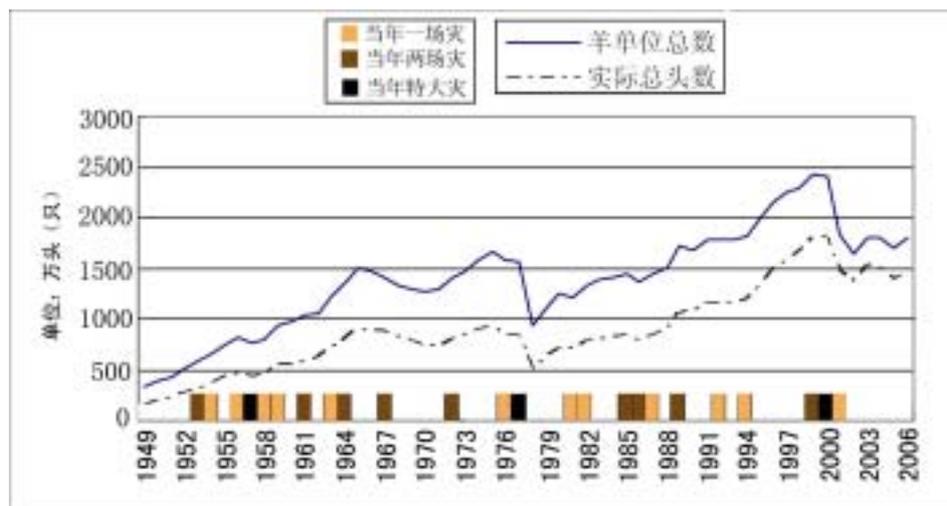
产产品的统一性等特点。因为内蒙古草原畜牧业是由草原——牲畜——牧民三要素有机构成的一种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其中，草原生态系统是一个极其脆弱的子系统。因此，如果草原生态系统一旦遭到摧毁，必然会导致整个草原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崩溃。另外，与农耕经济所不同的是，游牧经济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出的产品是统一的，即游牧经济生产资料——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产品。因此，一旦遭受自然灾害袭击，游牧经济损失的不仅仅是产品，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遭受损失，因而所造成的损失往往也严重得多[4]。正因为如此，千百年以来，游牧民族清醒地认识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自然灾害的危害性，通过游牧生产制度和方式，成功地避开了这一危险性，确保了游牧社会经济几千年的可持续发展。

二、游牧经济“脆弱性”特点的“依据”分析

显然，目前人类还不能阻止自然灾害。但任何“自然灾害”与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之间并不一定都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当，完全可以减轻，甚至可以避免一些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通常，城市和农村通过工程手段，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而传统牧区则主要通过游牧和使牲畜充分抓膘等措施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尽管如此，不论城市、农村还是牧区都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及其经济损失。所以，仅仅“自然灾害频繁”及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本身，不应当成为确定游牧是否具有“脆弱性”特点的依据。在评估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时，应当历史地具体分析任何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应当把一切责任都简单武断地归咎于自然灾害。有些经济损失无法避免，而有些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则与一定的体制弊端和决策失误等有必然的联系。

在证明草原畜牧业“脆弱性”特点时，人们列举较多的“证据”是1949年以来牧区牲畜损失的统计数字。如“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六五’期间，国内各主要牧区每年因灾死亡的牲畜合计都在400~700万头只，约占年初总头数的5~10%，牲畜死亡累计数大致相当于出售累计数或更多一些”[1]、“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0多年来，因灾害性气候而死亡的家畜总数还高于上交国家的总数。仅1957、1960、1969、1976、1978这5年内，受灾死亡的家畜就达1475.9万头只，相当于1979年总数的44.5%。所以，全年靠天然草场游牧的畜牧业有其很大的脆弱性”[6]等。的确，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草原畜牧业因灾死亡牲畜数量很大。但是，应当具体分析这些经济损失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直接原因（图1）。

图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牲畜头数变化与自然灾害关系图



资料来源：文献[7]，[8]

图1表明，1949~2006年，我国最大传统牧区——锡林郭勒盟牲畜头数变化总体趋势有三个增长时期和三个下降时期。令人费解的是，其中两个持续增长时期恰好是50多年中自然灾害最频繁的两个时期——1949~1966年（1957年还有一场特大雪灾）和1978~1999

年；而牲畜头数下降的三个时期，两个是遭遇特大自然灾害——1977年特大雪灾和1999~2000年两个旱灾夹一个雪灾；另一个却是在自然灾害最少的1967~1971年。

通过调查研究，对锡林郭勒盟近57年不同时期牲畜头数变化解释如下：

1949~1966年间，在自然灾害最频繁、生产经营“落后”、“粗放”条件下，牲畜总数呈稳定的上升趋势，17年翻两番多，是历史上增长率最高时期。1957年特大雪灾都没有造成大的损失，与1977年和2000年的特大雪灾形成鲜明对比。这主要得益于当时草原完好，牧草高于积雪，积雪不会“硬化”，牲畜不缺饲草；因地制宜政策，传统应急经验，集体防灾能力强；遇到自然灾害时，在政府协调下，跨旗、盟游牧，能够有效躲避自然灾害等几方面因素综合作用。

1967~1972年，牲畜总头数下降阶段，主要由于“文革”高峰期的严重破坏。

1972~1976年，牲畜总数上升阶段，主要原因：“文革”后期的破坏性影响减少、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和实行有限游牧，能够躲避部分自然灾害。严格说，应该是畜牧业得到恢复。

1976~1978年，牲畜头数锐减，主要是“大锅饭”分配制度、1976年旱灾和1977年特大雪灾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1978~1999年，牲畜总数上升阶段，主要是由于国家赈灾政策、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牧区实行“两定一奖”的激励政策以及牲畜承包到户等措施帮助牧区恢复生产和激发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这一阶段草原生态环境遭到了灾难性破坏。

1999~2001年内蒙古牧区连续3年遭受严重的旱灾和一次雪灾，虽然牧民的基本建设配套完备，生产已经“集约化”经营，牲畜损失却十分严重，损失幅度远远超过1977年特大雪灾，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草场整体退化，牧草减少；另一方面“定牧”后无法游牧，无法躲避自然灾害。

2002~2005年，总体上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牲畜头数仍然持续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草场严重退化，政府又启动“围封转移”战略、实施“春季休牧”、“畜种改良”、“退牧还草”、“草畜平衡”等等措施，都在减少牧民收入的同时增加了畜牧业生产经营成本，使牧民不堪重负，造成牲畜头数急剧下降。

另对上述57年中最大的三次自然灾害进行比较分析（表1）。

表1 锡林郭勒盟三场大灾牲畜损失及相关因素对比分析表

发生灾害时间	发生灾害类型	积雪或干旱	牧草高度	损失牲畜	生产方式	基础设施状况	生态环境状况	抗灾主体	经营体制	灾后相对贫困	灾后恢复情况
1957年11月20日-3月	特大雪灾	30-40cm	50-60cm	10万头只	游牧	差	好	牧民政府	互助合作	中5%	快
1977年10月26日-4月	特大雪灾	40-50cm	20-30cm	320万头只	半游牧	中	中	政府牧民	生产队集体	轻2%	较快
1999-2001年	旱灾夹小雪灾	三个中旱20cm	10-20cm	433.5万头只	定牧	好	差	牧民	家庭承包	重40-50%	难以恢复

资料来源：文献[7]、[8]、[10]以及实地调查采访

从表1可以看出，牲畜损失数量与灾害天气本身的程度（如积雪厚度或干旱程度）关系不是十分紧密，而与生态环境状况、牧草高度、生产方式、基础设施等因素关系密切。具体而言。在上述三场特大自然灾害中，牲畜损失数量与牧草高度呈明显的反比关系，而与游牧生产减少程度、基础设施改善程度、生态环境恶化程度等呈明显的正比关系。从而，充分

揭示了恶劣脆弱自然环境中草原畜牧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内在运行机制与规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一)1949年以后30多年的草原畜牧业因灾死亡的牲畜数量大(确切地说是1967~1978年)的主要原因在于“文革”破坏、游牧范围缩小、实行“大锅饭”分配制度,而不是草原畜牧业的“脆弱性”所致。由于生产队吃“大锅饭”,牧民生产积极性低,牲畜抓膘情况差,因而牲畜抗灾能力低,死亡率高。在农村,如果农民生产积极性低,粮食减产,全国挨饿;而在牧区,如果牧民生产积极性低,牲畜抓膘情况差,牲畜死亡率就上升,尤其子畜死亡率更高。在1970年代初的正常年景,笔者曾亲眼目睹过生产队库房里堆积如山的牧户交上来的集体羊群的羊羔皮,能够满足供应牧民做冬季穿的羊羔皮蒙古袍。1980年代初牲畜承包到户以后,同样是“脆弱”的草原畜牧业,也有自然灾害,羊羔几乎不再死亡了。牧民开始苦于没有羊羔皮做漂亮的冬季穿的羊羔皮蒙古袍。这表明当时牲畜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草原畜牧业本身的“脆弱性”特点,而主要是“大锅饭”分配制度所致。另外,当时牧民自食牲畜比重远高于现在。虽然,当时生产队对牧民食用牲畜管理极为严格,但毕竟“县官不如现管”,而且终究牲畜是生产队集体的,以牲畜生病或病死等名义以及冬初大家统一屠宰牲畜,以度过冬春季。在锡林郭勒盟北部牧区,冬初屠宰牲畜时,每户牧民平均6口之家,每年自食两头牛、30~40只羊是平常事情。这就是当时他们的正常消费水平。而现在牲畜是自己的,杀一只羊,一家人不够吃5天。目前一只羊至少卖300元,如果买粮食蔬菜等,一家人够吃一个月。因此,现在牧民自食量大幅度减少。同时表明,生产队“大集体”时期,牧民自食量大也是牲畜减少的影响因素之一。

(二)游牧范围缩小,增加践踏破坏草原的同时,牧民很难躲避自然灾害,造成牲畜大量死亡。1958年后,牧区实行严格的行政区划管理与生产队境内放牧制度。尤其1966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牧民出生产队,必须办理上级机关的“介绍信”。所以,超出生产队范围的游牧就变成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只要旱灾或雪灾范围覆盖整个生产队行政区范围,牲畜死亡率就必然上升。

旱灾是内蒙古牧区影响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发生频率最高的自然灾害。根据占内蒙古牧区78%的中西部地区500年的旱涝史料分析,干旱年份占70~75%,存在“3年约有两年旱,7年左右一大旱”的规律。1951~1990年,内蒙古牧区干旱频率为92.1%,为“十年九旱”,其中出现中旱以上的频率为76.3%,为“3年两中旱”,出现大旱的频率为28.9%。为“三年一大旱”[9]。可见,干旱是内蒙古牧区最主要的自然灾害。

1998年内蒙古牧区大部分地区雨水丰沛,牧草繁茂,但同时遭受旱灾的面积有520万hm²。由于草场承包到户,不能游牧,无法躲避旱灾,遭受旱灾地区牲畜死亡3.1万头只[9]。如果在游牧时代,这一巨大损失就根本不会发生。显然,近几十年在内蒙古草原牧区,旱灾和一般性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牧民贫困化与游牧范围缩小或不能游牧密切相关。

(三)1977年10月16~19日,作为全自治区最大牧业区的锡林郭勒盟普降大暴雪,全盟范围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积雪厚度普遍在40~50cm,远远超过牧草高度。从总体来说,这次特大雪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与以下两方面原因有关:一是当时牧民都在秋季牧场,还未转入冬季牧场(根据经验,牧民把冬季牧场布局在降大雪概率低、背风向阳的草场,而且具备一定的抵御雪灾的基础设施,因此雪灾损失一般不会很大);二是这场大雪开始为雨雪,后降大雪,并且由于气温骤降,水变冰,雪变冰,牲畜无草吃,全盟损失320多万头(只)牲畜[1]。但也不能忽视“大锅饭”分配制度、决策失误等因素的影响。在这次特大雪灾中,锡林郭勒盟9个牧业旗市受灾损失情况不同。

锡林浩特市和西乌珠穆沁旗的损失较重,主要原因是积雪最厚的地区,锡林浩特市域最厚达到58cm。而南部正镶白旗损失最小,只有20%。这是因为该旗草场面积狭小,只有冬夏两季草场。因此,该地区1949年以前就已实行定牧或半定牧生产制度。但由于年降雨量在

350mm 左右，草场产草量相对高且稳定。因此，不论有灾还是无灾，该地区牧民秋季都要为为数不多的牲畜存储大量干草，主要通过饲养，度过冬春季节。因而雪灾对其影响不大，所以受灾损失小。而同样作为重灾区且环境更恶劣的东乌珠穆沁旗损失也小。其中，塔日根敖包和陶森宝力格等两个嘎查统一组织牧民跟着马群及时转场。种马们（种马历来是牧区自然灾害的“预报员”和避灾的“向导”）率领着四千多匹的马群在前刨雪开路。当时是秋末，牧草没有完全变黄。所以，积雪“青储”了牧草。只要刨开雪，牲畜就有充足的优质饲草。牛羊跟在马群后边，吃着牧草和马粪（马的饲草分解率只有 50%左右。因此，受雪灾时，马粪是牛羊的上成救急饲草）走到边境附近积雪少的草场过冬，牲畜损失不到 4%，为此曾受到过上级表彰。这与当时该旗领导正确决策和牧民善于游牧等因素有关。

（四）领导决策失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遇到自然灾害时，对边疆地区牧区生产的严格管理近乎达到军事化程度，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1977 年特大雪灾时，内蒙古阿巴嘎旗的损失最大。据阿巴嘎旗德力格尔嘎查 56 岁牧民朝伦介绍：他们嘎查 80%以上牲畜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旗领导：“把牲畜赶往远离边境的地方”的命令。因为该嘎查一部分在种马“领导”下，“擅自”到边境附近过冬的牲畜，第二年春天无一损失，全部安全返回，而到远离边境的地方过冬的牲畜则“全军”覆没。

综上所述，1949 年至 1980 年代初的 30 多年间草原畜牧业因灾损失严重的主要原因是游牧范围缩小和分配上的“大锅饭”制度，而不是所谓的草原畜牧业“脆弱性”特点。而且仅从“自然灾害频繁”及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得出“草原畜牧业脆弱性特点”——这种理论性结论，论据不够充分。退一步讲，如果内蒙古高原游牧经济真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脆弱”，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就自己灭亡了，更不可能创造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和游牧文明。所以，以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作为改造传统草原畜牧业的依据，如：“改传统的放牧方式为放牧加舍饲，实行科学的管理，将各种综合措施组装配套，才能彻底克服其脆弱性” [1]、“走农牧结合的道路” [6] 等等，不仅不符合牧区实际，这也正是今天内蒙古牧区生态环境和牧民生计全面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1977 年特大雪灾中，在十分“粗放”、简陋、严酷的条件下，苏尼特右旗牲畜损失了 32% [11]。而在“实行科学的管理”，“走农牧结合的道路”，“各种综合措施组装配套”的 1999~2001 年远比 1977 年雪灾小的自然灾害中，“仅仅 3 年时间，牲畜存栏量锐减 65.3%” [11]，而且使该旗多数牧民空前地沦落为贫困户，甚至生态难民，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生存与文化存在的基础条件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006 年 7 月，笔者采访蒙古国东戈壁省巴音吉日嘎拉苏木人大主席乌云夫先生。1998~2006 年，该苏木 30 万 hm^2 草场牧草长势分布及牧民放牧区域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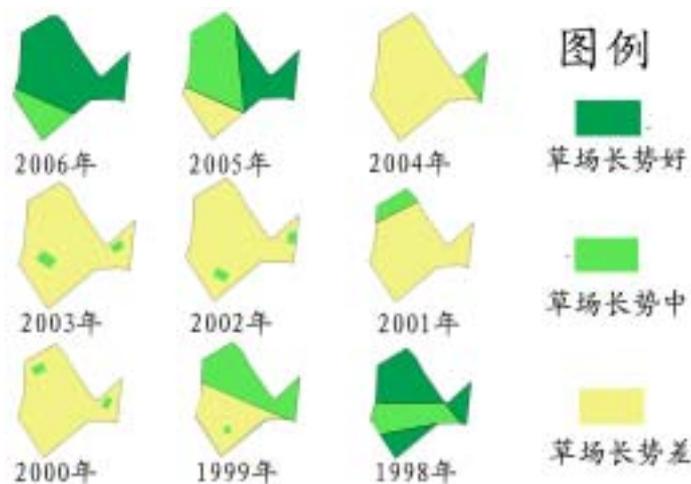


图 2 1998~2006 年，蒙古国东戈壁省巴音吉日嘎拉苏木草场牧草长势示意图

1999~2004年，该苏木连续六年遭受大面积严重旱灾（而苏尼特右旗只遭受连续三年旱灾。因此，该苏木所受灾情应该更重），但通过游牧，躲避旱灾，牧民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和牲畜损失，又减少了牲畜对受灾草场的践踏破坏，游牧——一举多得。

1999~2001年三年旱灾期间，多年平均降雨量低于苏尼特右旗的蒙古国东戈壁省巴音吉日嘎拉苏木仅损失了11%的牲畜（表2）。

表2 1999~2001年，内蒙古、蒙古国相邻半荒漠草原牧区受灾情况比较表

比较地点	年降雨量	损失牲畜比重	生产经营方式
苏尼特右旗	177毫米	65%	定牧
蒙古国东戈壁省 巴音吉日嘎拉苏木	130毫米	11%	游牧

资料来源：文献[11]、蒙古国实地采访

表2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在内蒙古北部锡林郭勒盟牧区，究竟是“粗放”的游牧脆弱，还是“集约”的定牧脆弱问题的唯一答案。由此可见，“实行科学的管理”、“各种综合措施组装修配”，不仅没有能够“彻底克服”草原畜牧业的“脆弱性”，反而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破坏了草原畜牧业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和游牧文化，让全自治区几十万牧民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更破坏了国家的生态安全体系。“定牧”使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真正成为脆弱的畜牧业。在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对草原畜牧业特点的归纳与定性，误导决策，给内蒙古，乃至全国的牧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和国家生态安全体系造成了灾难性损失。

至于，“定牧”破坏草原生态环境的机制主要是：

根据任继周研究，由于牧草刺激再生机制作用，放牧两周时，草场生产力增长一倍多。如果继续放牧，草场生产力则迅速下降（图3）[12]。放牧条件下的草场生产力这一变化规律与30年前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牧民在夏季15天左右的搬迁周期不谋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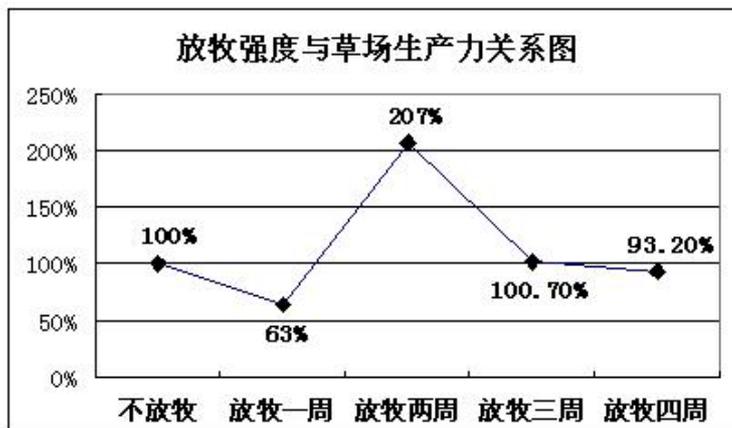


图3 放牧强度与草场生产力关系图

由此可见，与农耕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破坏生态、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相反，游牧生产是一种改善生态、创造资源、净化环境的生产方式。

然而，由于定牧，牲畜一年四季在几千亩的网围栏内，频繁践踏伤害草根以及土壤微量元素得不到补充和调剂，使草场生产力下降。加之几百万农民连续十几年搂发菜、挖药材等破坏活动，使草原地表枯草层完全消失，造成土壤水分和养分的大量丧失，使草场完全丧失自我保护的生态功能，草场生产力和生态系统遭到致命损伤；近些年打深水井，采深层地下水灌溉高产饲料地，使地下水急剧下降，对荒漠草原靠地下水生长的荒漠植被及其生态系统造成致命伤害；与此同时，在牧区普遍盛行的掠夺式滥采乱挖矿产资源的行径，使大面积草原遭到破坏，水源污染，地表水与浅层地下水大幅度减少等等人为破坏活动，最终导致整个

草原生态环境整体恶化[13]。

三、结论

(一) 应充分尊重内蒙古高原地理环境的强大作用力，坚定捍卫游牧生产方式。

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具有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系统脆弱、草场生产力水平低下且波动性大等特点。正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中，游牧民族才几千年以来坚持游牧生产制度，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游牧文明。这不仅表明内蒙古传统草原畜牧业卓越的生态智慧和能力，还能反映传统草原畜牧业的顽强生命力——非“脆弱性”特点。历史上任何一次改变游牧生产方式的行径都无一例外地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如历史上著名的古楼兰国的消失就是变游牧为农耕的结果[14]；年均降雨量分别为288mm和360mm(相当于锡林郭勒盟东南部典型草原地区)的库布齐和毛乌苏等沙漠沙地都是变游牧为农耕的结果，其下边掩埋着几十座古代城镇[15]；现代内蒙古八大沙漠和沙地的七个是“人工”制造[16]。这些当时最好的草原都变成了浩瀚的沙漠。而现存的一点草原远比那些草原脆弱得多。近几十年内蒙古草原整体急剧加速退化的事实正是证明了这一点。几千年以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在内蒙古高原严酷而脆弱的地理环境，只有游牧生产方式才既能有效躲避频繁的自然灾害，又能有效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也正是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上的游牧生产方式为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生态安全保障。然而，近几十年强加于传统草原畜牧业——游牧经济以“脆弱性”特点，并改变这种“脆弱性”的企图，基本破坏了两大高原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使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生态恶化威胁。中国应当成为两大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神”——游牧文化的坚定捍卫者。

(二) 牧区政策是影响草原畜牧业健康发展和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的主导性因素。

近半个多世纪草原畜牧业与牧区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因地制宜的牧区政策是内蒙古草原畜牧业与牧区能否顺利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在几千年的历史实践发展过程中，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生产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从地区实际出发的、智慧的游牧生产经营方式与制度。这些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共同财富。而简单粗暴地认为“传统游牧生产经营方式落后”、“传统草原畜牧业具有脆弱性特点”。并以此为依据，改造传统草原畜牧业，生搬硬套地理环境优越的发达国家或我国农区畜牧业生产经营模式和土地利用制度，必将落到事与愿违的结果。事实上，正是变游牧为定牧的改造，使草原畜牧业真正变为脆弱经济。

(三) 在内蒙古，保护和发展游牧生产方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

游牧生产方式是使内蒙古高原人、草、畜三要素和谐、高效、良性运行几千年的唯一生产方式。保护和恢复游牧文化是有效保护内蒙古牧区生物与文化多样性资源、我国北方生态防线以及发展优质畜牧业与特色旅游业等的根本保障。在全球化日趋加剧的今天，我们对改变生态脆弱或恶劣地区传统生产方式问题应当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任何一种传统生产方式都是按照当地生态环境的特定“要求”而历史形成的，具有其充分的生态系统和地理环境依据。仅仅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问题或过分夸大科技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潜在的和长远的负面影响，而盲目草率改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具有很大的生态与经济社会风险，甚至可能会毁掉人类自身基本的生存条件。一个地区传统生产经营方式主要基于其生态环境的基本特性而形成的。而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基本特性是地理环境决定的，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因此，在评价一个地区传统生产经营方式时，应当克服各种偏见和成见，认真研究其生态环境依据和意义，保留和发扬传统生产经营方式中的精髓，并且补充和完善，使之更好地为当地社会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服务。在内蒙古牧区，这些应当是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 [1] 道尔吉帕拉木. 集约化草原畜牧业[M]. 北京: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6.
- [2] 陈文. 草原畜牧业经济研究[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2.

- [3] 贾幼陵.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第 12 次会议在京召开. 人与生物圈通讯[R]. 2007 (1): 8
- [4] 海山. 试论内蒙古草原牧区畜牧业生产特点[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0, (3): 6-7.
- [5] 嘎林达尔. 苏尼特右旗畜牧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 [6] 孙鸿良, 赵献英. 试论我国温带草原生产力特征及其合理利用与建设的方向[J]. 资源学报, 1984, (2): 54-59.
- [7] 齐伯益. 锡林郭勒盟畜牧业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 [8] 国家统计局内蒙古农业调查队. 内蒙古各旗县畜牧业统计资料[R], 2000. 统计表 2007.
- [9] 能乃扎布. 牧区灾害学[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9.
- [10] 《锡林郭勒盟辉煌的 50 年》编委会. 锡林郭勒辉煌的 50 年 1947—1997[R]. 1997.
- [11] 张立中. 中国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39.
- [12] 任继周等. 关于提高畜牧业生产能力的几点认识. 新疆农业科技. 1974 (1)
- [13] 海山. 内蒙古高原牧区贫困化问题研究[A]. 恩和、额尔敦布和等主编. 中国北方环保型农牧业与循环经济[C].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92.
- [14] 谢丽. 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J]. 中国农史. 2001 (1).
- [15] 侯仁之、邓辉. 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文集[A]. 商务印书馆. 2006.
- [16] 景爱. 不能再走“人工沙漠”的老路. 人民日报 2003-04-04.

The study of steppe stockbreeding "frangibility" characteristics problem in Inner Mongolia

Haisan

(The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of Th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u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2,)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environment tends to be worsen in herd area in Inner Mongolia in recent 20 years.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me mistaken theories. Such as for long time, Some scholars think "flimsiness" is a grea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steppe livestock husbandry in Inner Mongolia, and take this as an excuse, try to carry on a reformation to the steppe livestock husbandry, but as a result make the whole economic of steppe livestock husbandry in Inner Mongolia sink into development predica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flimsiness" characteristics of steppe livestock husbandry in Inner Mongolia that scholars often quotes, and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flimsiness" isn't the character of steppe livestock husbandry in Inner Mongolia at all, "Flimsiness" of the steppe livestock husbandry mainly doesn't lies in natural calamity, but lie in a person's disaster etc.

Keywords : the steppe livestock husbandry; flimsiness ; natural disaster; geographic environment; Inner Mongolia

收稿日期: 2008-9-18;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新牧区建设与发展研究——以内蒙古牧区为例。》(批准号 06AMZ002);

作者简介:海山(1959—),男,蒙古族,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人,理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人文地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与规划工作,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学术研究成果50余部篇。